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美〕弗兰克·H. 奈特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叔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美〕弗兰克·H.奈特 著

安佳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美)弗兰克·H.奈特著;安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经济学)

ISBN 978-7-100-13864-2

I. ①风… II. ①弗… ②安… III. ①新制度经济学—研究 IV. ①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654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

〔美〕弗兰克·H.奈特 著

安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864-2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3¼

定价:50.00元

Frank H. 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1

本书中文版根据美国霍顿·米夫林公司 1921 年版译出

并增补作者历次重印版前言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志,不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初 版 前 言

本书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只是试图比以往更准确地阐述传统经济学说的基本原则,并更清楚地揭示其含义。这就是说,本书的目的在于改进而不是重建,是一种“纯理论”的研究。这种表达的背后动机有两个。第一,面对当前这个时代讲求实用和平庸的趋势,特别是我们这个国家思想上的特点,笔者本人希望,在社会问题领域中进行缜密的思考,对人类的福祉终究会有些意义。第二,笔者有种感觉,这个时代的“实用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即还存在一股对粗疏和浅薄思想的强烈不满的暗流和一种完全出于知识自尊的、对表述思想的流行学理与术语有更清晰的理解的真实渴求。本书会在合适的地方首先对这些假定进行适当的阐述或辩说。

一般经济学研究的“实用性”理由是,相信通过改善满足欲望活动的组织形式,人类生活质量也有改善的可能。更具体地说,多数社会改良的规划,都涉及到更有意识地用社会的或政治的控制形式,来替代私人财产和个人契约自由。当前这些研究所暗含的假设是,如果这种性质的变化对被提出要进行修正或替换的制度之本质和发展趋势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的话,那么,将为真正的改善提供更大的机会。因此,本书致力于对一个社会群体中,作为稳定和引导协作活动的制度和方式的自由企业的本质特征,进行梳理



和界定。这种努力要获得成功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即我们假设,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一定要与对被研究的制度之批评和辩护彻底分开。我们首先希望,凭借指明这一体系是什么,能达到进一步揭示这一体系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目的。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目的是,要对经济组织的问题、在经济组织中没有发生变化的东西、经济组织的状况以及组织运作的机制的各种数据,进行系统的阐述。为这些基本原理给出一个严谨而明确的概念,被视为是解答下列问题的必要基础,如什么是我们期望的合理的组织方式,这类组织是否会因为没能获得合意的结果而遭到责备;如果会出错的话,它会在什么地方出错;以及,哪种变化和替换为合理正当的改善试验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这一研究的最终结果绝对不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辩护,相反,它或许强调指出了自由企业与生俱来的缺陷。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谨慎的分析也让我们注意到了问题的根本难点和根据社会机制的区区变化过分乐观地进行预期的愚昧。只有这种特定的基础性东西,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或曰,包括在经济学理论的范畴之内。对于社会政策问题的最终裁决,要取决于对组织体系的其他可能性进行类似的研究,以及这些可能性与完成任务相关的自由企业的比较。这种“结论”或许下得有些冒险,因为,没有哪一种组织形式能够满足或胜任所有领域中的所有目的。毫无疑问,在一个基本社会里,所有能想到的组织形式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问题在于哪种形式最适用于已确定的任务和社会为达成这一任务的活动范围。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企业家的作用,即对已获认可的这一组



织体系中的“中心人物”以及决定其职能报酬的各种力量,进行更全面更仔细的研究,以求对自由企业理论做出具体的技术贡献。

利润问题是 1914 年春季,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艾尔文·约翰逊博士向笔者建议的博士论文题目。约翰逊教授离开康奈尔之后,笔者的这项研究主要由阿林·A. 扬教授指导。在此我谨向两位老师表示诚挚的谢意。1916 年 6 月,论文在康奈尔大学获得通过并于 1917 年提交哈特、沙夫纳和马克斯公司赞助的论文比赛,后在芝加哥大学教授 J. M. 克拉克的编辑指导下,我又将论文全部重写了一遍。与我的同事 C. O. 哈迪教授的讨论以及拜读他尚未出版的《关于风险与风险承担》一书,令我获益良多。芝加哥大学的雅各布·瓦伊纳教授非常友好地阅读了全书的校样。我还受惠于许多经济学家业已出版的著作,由于这些书范围太广,数量又多,所以未能详细列明,尽管这些著作在正文和脚注的参考文献中都有不尽完整的反映。

弗兰克·H. 奈特

1921 年 1 月于依阿华州依阿华市



再 版 前 言

本书初版售罄之后,伦敦经济学院给了笔者极大的荣誉,将本书列为重印系列中的一种。另外,他们还惠允我撰写新版前言。我想,与其详述本书的由来或是纠正一些错误,我宁可利用这一机会,就本书所陈述的经济学理论作一些评论,而且我还认为,按照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原理进行思考的思路,也需要发展及修正。当然,我是假定这种努力还在继续进行。现在,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以供本书现在的读者讨论。

首先,正如本书内容所揭示的,我对经济学的兴趣从一开始就特别集中在理论的含义、理论推论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以及理论前提与现实的偏离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在 1915~1916 年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中首次得到了体现,此后,本人的这一兴趣还在增长。这些年来,我的时间都花在大学课堂的“理论”课上了。如果说,这一时期的一般趋势是盲目地反对“古典主义”,那么,美国的情况尤为明显。这种环境加上欧洲民主国家疏远自由主义的政治趋向以及经济学的受宠,再加上还要向一大帮没有什么学术兴趣或社会兴趣的学生灌输经济学——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我的思考



和质疑。我一直特别致力于弄清经济学前景看好的各种“分析方法”，而对这一问题有这么多令人费解的议论。我颇为不安地承认，这是某种方法论“体系”，或各种方法论造成的结果。虽然用其他研究来替代经济学价格理论的提议似乎都站不住脚，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赞成与之相反的看法，我希望就价格理论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有一个完整的阐述，并且就相同论题提出的其他分析方法进行适当的考察。

基于功利主义假设的经济学理论，即从“经济学”一词的本义所说的所有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纯粹抽象和形式化、且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学说。一般来说，它讨论的是某种规范的“经济”原则，并不涉及要利用什么或是如何利用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价格经济学讨论的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每个个人只把其他所有人和社会作为他自己这一个人经济(*privatwirtschaftler*)的手段和条件、一种鲁滨逊经济的机械组织来对待。它讨论的是给定的“所有者”，根据给定的技术体系对给定资源的使用以满足给定的欲望的过程，如何通过完全的市场体系组织起来。任何在给定时间和地点所发现的问题，诸如资源和技术等，都一定会在制度史上找到答案，因为与市场关系本身的客观体系一样，所有这类事情都显然是文化史的产物。（确实，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动机和过程意味着，通过在每种易于产生“收益递减”的投资途径上，对资源正确配置的努力，使给定资源条件下的给定收益最大化，这种努力或许也是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参见下文。）

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即从驱动体系的欲望方面看，价格理论天生就没有实质内容。因为在这种分析中，欲望必



须视为对已生产出来的物品和服务从事买和卖以及消费的欲望。但重要的是,这种欲望既不现实,也太抽象。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商品和服务缺乏内在属性;大体上,商品和服务就是社会关系或理想价值的象征性目标。古典经济学家犯了两个极为不幸的错误(其中一个稍后再论),这两个错误与把饮食当成一种经济利益相关。事实上,饮食本身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利益,但这里至少还没有提到“更重要”的欲望,比如说服装,因为这样会对分析带来不同程度的扭曲。当然,人们为了生理的舒适需要食物和具体的必需品,但是,满足这种需求所需要的手段实际上也要依靠历史上形成的社会标准。由于任何内在的性质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来说,都是一个最小的因素,所以绝大部分欲望都要通过市场获得满足。对经济生活任何合乎实际的论述,尤其是涉及到与经济生活相关的问题,都要求对动机的大小以及采用物理手段来实现目的的纯经济层次的范围,即所使用的手段的量的作用,有一个准确而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简单地举些例子来揭示这一问题的实质。

与生存和舒适相比较,欲望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审美因素(aesthetic)。在某种普遍意义上,审美的吁求要取决于其内在的本质,即在多大程度上它是文化的固定特征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它又是一个流行的或社会—历史的偶发事件的结果。长期以来,深藏于经济学讨论之内的这些问题才是最让我着迷的问题之一。与欲望中的审美因素交叠的大部分因素,是由具体的经济物品体现的纯粹的“社会”欲望,这与在竞技场上得分的渴望一样。社会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分属于这类两极化的形式,如相似与相异,



自由与权力,但在分析过程中,却从没有对此进行清楚的区别。另一个因素是想给人留下印象的愿望,这种印象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恶魔,或两者兼有,或是一种中庸的形式。社会动机也很少与经济动机绝对不符。类似的还有亲近感和新奇感,对一些特别满意的活动和成就的兴趣,以及对较广泛的利益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因素。(在本书的不确定性分析中,我仍然觉得这一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对许多学者坚持对可选择结果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感到困惑。他们分析不确定性,就好像是对一个已知的数学概率下赌注一样。尤其是,我可能说过,我对庇古教授在《福利经济学》附录一中将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因素加以处理的方法实在不解,或者具体地说,对他的一般因素概念弄不明白。)

最后,动机中的非理性因素所具有的最大实际意义就是评估。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部分深思熟虑的行为(*deliberate action*)都受到要得当或做得正确之意愿的影响。但是,希望做得对,或尽可能解决问题,并不能归类为指望得到什么特殊的结果;一旦对一个问题感兴趣,人们甚至不愿意别人为他找出正确的答案。这一结论对经济学理论来说,更是意义深远。在某种意义上,它必定涉及到行为的目的,或者说,它与经济概念无涉,更不必说与经济问题有关。但是,根据科学数据能被视为目的的唯一概念,只是个人心中对一种可描述事物或现有状态的意愿。当前社会心理学中好几派理论都趋向于同一种看法,即大多数自觉意愿,说到底就是希望在人类社会中以某种方式起到一定作用,或成为某类人物而已。我们已经指出,个人和社会的理想不能从物理形态上加以描述,因此也不能纳入根据有关所谓“科学”的描述而获认可



的论题的范围之内。这些内容实际上已经属于意义和价值范畴(好或坏、聪明或愚笨不在考虑之列)。

但这并不意味着难题的解决。对任何社会理论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对这类事情所作的描述,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是非科学的,我们同时也要明白,这种讨论还必须深入到从智性上讲更为棘手的领域。一旦人们开始讨论这种理想,就会要求一种必须遵从的准则,即一种在规范的或道德的层面解决问题的因素。对理想的讨论不能局限在纯粹的描述中——虽然诸如此类的描述还是可能的。实际上,从不同的意义上说,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科学描述的是观察者应该见到的事物,以及如果他观察正确的话,他将会看到的事物。选择何者作观察则纯粹是一种自我思想感情的流露,一种自我启示,与之相关的任何兴趣都是文学的,而非科学的。相应的是,任何社会科学都暗含对“真实社会价值”的识别与讨论。所有这一切的意义在于,经济学不能只是经济的而不包括政治和伦理学的内容在内。要获得这种具有科学性的方法,只有努力弄清不同层次的描述和评估的关系后才有可能。这里的困难在于,阐述者的趋向是完全相反的,对数据感兴趣的人力争用具体实际来进一步强化真实情况,对政策感兴趣的人则试图通过渲染其观点的科学客观性来增加自己的感染力。因此,对经济学理论在解释清楚价格与价值,或是解释清楚分析与宣传二者的关系上,进展得如此之缓慢,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以不同的行为观为基础,或者,以那些多少受到专门注意的行为的不同方面或行为的各种要素为基础,我们大约有六种分析经济现象的主要方法。(1)排除主观的或人的因素,对具体数据,即



对商品和价格进行统计学分析。因为除了自然资财必然成为商品的一个类别之外,其使用也是这样,所以这种讨论只暗含了经济学,无法真正开展。(2)将动机看成一种事实而进行的分析。这是一种多少与传统经济学概念极为相似的概念,进行此种分析的学者不太重视政治取向。但因为与被观察的行为结果相关的动机,只能客观地进行定义和分类,所以,如果这种方法自称具有完全的客观性,那么就会撞上第一种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实事求是地对动机进行了分析,它就必须承认,相对于社会形态而言,这类分析方法是抽象的,而且通过两方面的谬误,即达成一个目标的错误和目标本身的概念上的错误,而迥异于实际的行为。(3)对动机、社会信条(social-symbolic)及伦理中的其他因素的识别,将使分析从人文意义上更实际、更真实,从客观的自然科学意义上讲,则少了一些科学性。

(4)上述第三种方法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社会政策的考察,但在这种分析中,由于政策和结果都是一种事实,所以这种分析也具有一定的客观可能性。然而,因为所讨论的方法本质上是诸种游戏规则以及不同游戏或社会制度的结果,所以,这些概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相去甚远。科学工具主义设想每个个人都竭力为了自己的私人目的而与他人竞争。这一点靠“科学的”手段是做不到的,因为,从技术上讲,这里主要采用的是强制、说服和蒙骗的手段,这种手段从人与客观对象的关系上讲,没有任何意义。社会结果的特征意味着无需对其进行评论。(5)对合乎制定者的心意或其所期望的社会政策进行公开鼓吹或是宣传。对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在有限的范围内,区别开期望的东西和合意的东西,是关



乎生与死的事情,但当前却有一种混淆两者的趋向。与(4)和(5)相关联,保存具体意义上的目的和社会关系形式上的目的之间的区别,也很关键。对一种抽象关系即自由的分析,造成了对古典经济学传统概念的严重损害。这些学者不仅是将对自由的鼓吹与对自由制度的分析相混淆,而且以一种极为错误的方式将自由设想成一种以极大化愉悦为目的的手段。从人类自身的经济福祉看,除了那些能让他们更为聪明地做决策,而不是为他们做决策的信条之外,人类所渴求的或许是,或实实在在就是自由。同样明显的是,人们或许会视自由为一种价值,一种责任,为禁止个人摆脱法律的约束,所有的西方法律制度都如此看待自由。(另外,在一个较为宽泛的限度内,人们或许会提倡将自由作为一种选择,即对政府因试图履行自己无法履行可能有益的职能而使自己元气大伤的一种选择。)古典思想家们似乎也忘记了,经济自由是使用经济权力的自由,其内涵涉及从奴隶制到依仗对经济权力的分配而奴役他人的诸多方面。古典思想家们甚至提请人们注意每个人改善自己状况的渴求,包括改善其继承人的状况的渴求,但他们没有注意到,用权力获得更多权力的自由,涉及到不平等的一种累积趋势。

(6)将注意力集中于历史和历史因果关系而产生的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一旦我们超越了静止经济的抽象前提条件进行讨论,或是讨论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涉及的就是这样一种分析立场。实际上,求助于经济动机来解释历史变化,是一种普通的做法,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信条的第一款,而这种做法也轻易就被那些从未对经济学概念作过审慎研究的历史学家囫圇吞下。(在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经济学解释的时候,经济学家



也在致力于经济学的历史解释,这有点像许多心理学家成为 18 世纪那种唯物论者,而物理学家却在唯理、唯心和空想。)简而言之,如果、且在一定程度上,经济条件的变化是“理性”节制(而不是“等待”)和投资的结果的话,影响经济生活的条件之变化本身,就可以用经济学术语进行解释。这一点也适用于变化、情感需求、资源和技术三个领域。人们把对现在与未来的权衡,看做与其他经济比较相似的事情,并非没有意义。但是,除了已经提到的经济动机的视角的局限性以外,就未来所作的当前牺牲,也必然意味着一种直接的、确定的并可预见的牺牲,意味着从各个相反方面对人之未来的保障,意味着已经明白,这一未来主要存在于做出选择之人的生命期间之外。经济发展涉及的是“现在物品”永久性地转变成收入,实际上,是短期内的大笔收入转变成长期内的小笔收入。值得提出的是,我们能否把“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的利息,从经济上看做是完全合理的东西,实际上,如果这类利息在实际储蓄和投资上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也是很小的作用。即使这样,真实的动机差不多或完全就是真实的消费动机,也就是说,是象征性的和抽象的动机。

由于古典经济学没有能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也没有能够对既定条件下一系统的运行,包括趋向于均衡的运动,以及既定条件或制度本身内在的变化,做出清晰而准确的理论区别,所以,我必须将此视为古典传统中一种主要的谬误。这种情况在涉及到这类历史变化时滥用经济动态概念的表现中得到反映,严格地说,这里涉及的只是既定条件下系统趋向于均衡的运动。古典经济学家没人用一种意思恰当的语句——一种可被视为历史变化

